

七大代表忆七大

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七大代表忆七大

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七大代表忆七大》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李忠杰

主 编 黄修荣 刘益涛 张延忠 李 蓉

副 主 编 李树泉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宝塔山下。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与主席台。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内景。



延安摄影师镜头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版图片均选辑自当年延安电影团摄影队的摄影师们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现场拍摄的纪录影片资料)





1995年6月16日，出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纪念‘七大’50周年座谈会”的部分七大代表合影。



2000年7月，40多位七大代表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出版座谈会”时合影。

序 一

龚育之

一部七大代表忆七大的回忆录就要出版了。组织编写这部书,是七大召开 50 周年的时候。50 年前参加七大的代表,这时尚存的,已经不多了。为这部书撰写了回忆或接受了访谈的,有 100 位。其中几位在这几年中又凋谢了。抢救出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从发掘和保存史料上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了建党以来、六大以来、抗战以来党的历史,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开启了党和人民未来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八大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深化和加强对这样一次重要会议的研究,对于了解历史很有价值,对于启迪现在也不无价值吧。

七大上的三大报告(毛、刘、朱),当时都已发表,若干重要发言(周、任),也已在他们的选集中发表。特别是七大 50 周年时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公布了过去未曾发表过的一批在七大和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口头报告、总结的讲话,为研究七大提供了极重要的文献材料,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兴趣。听说,中央有关单位还准备合作编辑七大历史文献集,提供更为详尽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者们都在盼望着。这里提出一点希望,就是在这个文献集中,最好能同时收录《论联合政府》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当时(七大时)公开发表的版本,一个是建国以后(1953 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 3 卷时经过稍许删改的版本。两个版本都是正式的、重要的版本,从研究历史来说,不可以偏废。因为前者反映七大时历史的准确面貌,后者反映修订《毛泽东选集》时的思考。在何时,在何种背景下,基于何种考虑,作了何种修改,这本身已经成为历史,已经是历史研究的课题。前不久,报刊上宣传某地“发现”了《论联合政府》的一个未曾见过的珍贵版本,其中有些今天看来很有启发的话(例如,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等等),是现行版本中没有的。这其实就是当时公开发表、直到《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出版前广泛发行的版本。在今天的历史文献集中收录这个(和这类)版本,研究者就不至于把它当作“珍本”来“发现”了。

附带说一句,这样来处理历史文献集,是已经有过先例的。80 年代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抗战时期的文艺理论之部时,经过批准,按当时(1943 年)公开正式发表的版本收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 1953 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 3 卷时,这一篇也是有稍许删改的。

档案文献在准确可靠方面,比当事人后来的回忆要强,因为人的记忆总是难免发生模糊和误差的。但是,档案文献也有局限性。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提供许多档案文献中所没有的可能是很

七大代表忆七大

重要的东西,可以提供许多生动的背景和细节,可以使档案文献中一些材料由于当事人的回忆而得到说明乃至补正,可以说,许多回忆不但补充了档案的不足,而且使许多档案活起来了,站立起来了。薄一波同志回忆录中关于赴延安参加七大的章节,就给我们以这样的感受。这部回忆录中的许多篇,也会给我们以这样的感受。

如果在20年前,40年前,让那时健在的许多七大代表,根据那时在他们脑中还比较鲜活的记忆,写下他们的七大回忆来,该能给我们留下多少重要而生动的史料啊。

往者不可追。今天,应该支持和鼓励我们的老同志们,及时写出他们所亲历的、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为今人和后人多留下一些珍贵的史料。

人们对过往的记忆难免有误失,这有生理心理的原因,也会有其他的原因。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记忆中情节可能有出入,至于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价,更可能所见有所不同。怎么办?不好办,也不难办。提倡讲大局,讲党性,忠实于历史,忠实于事实,尽可能查考文献,尽可以找其他当事人核对。还会有分歧,那就各存其忆,各存其见,相互补充,相互校正。这样的一种办法,有利于从比较中较为正确、全面、完备地揭示历史的真实。

这部回忆录中,也会有所忆所见有所不同的地方,我看,编者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处理的。这也是一种百家争鸣吧。

[本书初版原名《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7月出版。此序系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当年为之所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的同志们经过数年的努力,又征集、整理了一百四十多位七大代表的回忆文字,连同原先已发表的一百篇回忆录,增补编辑成现在这本新书,定名为《七大代表忆七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仍将龚育之同志的序冠于书前,特此说明。——编者注]

序 二

李忠杰

有党,就有党代会。甚至从最初的起点来说,有了党代会,才有了党。所以,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从那以来,我们党已经召开了16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代会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的特殊的地位和职权。

党代会的地位和职权是什么?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还没有来得及作出明确的规定。但从党纲的字里行间,如“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本纲领需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修正案时方可修改”等,我们可以推导出,党代会的职权有: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和修改党纲等。

从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始,党代会的地位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是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开始曾称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从1969年九大所通过的党章开始,又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就开始形成了双重领导机关制。无论是单一领导机关制还是双重领导机关制,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地位都是确凿无疑的。

与此相联系的党代会的职权,1927年6月的党章第三次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四个方面的工作:“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审查与修改党纲及党章”;“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策的方针”;“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及其他”等等。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之后,我们现行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有六个方面的职权:(一)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听取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四)修改党的章程;(五)选举中央委员会;(六)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代会的这种地位和职权,无疑便决定了它在党的建设和发展中的意义,决定了它是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每次党代会,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都要总结和审查过去特定阶段内的工作,研究和分析当前时期的形势、任务,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或重大任务,制定今后一段时期赖以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还要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每次党代会,都反映着在这个时期内党的认识水平、价值取向和基本意志,也反映着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抉择。因此,都是党的一定时期内政治状况、政治意志的集中体现。

回顾我们党召开过的16次党代会,都是在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多数都真正履行了它的职权,研究了紧迫的重大问题,并且作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决策,因而对当时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七大代表忆七大

第一次党代会，解决了建立一个新型政党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竖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第二次党代会，划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阶段问题。

第三次党代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重大方针，推动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随后的几次党代会，都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些紧迫问题。

本书研究的第七次党代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为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完整的新党章，第一次把党的纲领作为有机部分写进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进一步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这次大会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即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确定了党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纲领、路线和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十二大到十六大，每一次代表大会都解决了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深化的一些重大问题，推动了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每一次代表大会都开得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历史证明，一次成功的党代会，往往就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党的前进所达到的水准和程度，也标志着党面向未来将要遵循的前进方向。1921年的一大、1945年的七大、1956年的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次党代会等等，都具有这种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些成功的代表大会，都对当时甚至之后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当然，有没有虽然履行了职权，但未曾解决问题、甚至把问题搞得更乱、更糟的会议呢？也是有的。九大就是把问题搞得更糟的会议。十大，由于整个路线方针是错误的，所以，并没有解决问题。十一大，想解决一点问题，但由于基本的理论错误没有纠正，所以实质性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这种不成功的甚至错误的党代会，或多或少给党的事业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危害。开成这样的会议，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党正徘徊在一段曲曲折折的道路上。

党代会能否正常和如期召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党所处的环境，反映党当时的政治状况和认识水平。从一大到五大，大体能如期召开。但从六大到七大，间隔了17年。这期间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像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甚至像抗日战争这样的大事，都是通过其他形式而没有通过党代会来研究决定。七大到八大，间隔了11年，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也不是通过党代会来研究决定的。八大之后，八大制定的路线被改变，发生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改变国家体制、审查和处置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没有通过党代会来研究决定。所有这些，

都不符合党章的规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战争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不可否认也有党犯严重错误的原因。如八大到九大期间，就是党逐步犯了严重错误，党内民主受到破坏，致使党的代表大会也不能如期召开了。即使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邓小平也说：“党的第八次大会同第七次大会隔了十一年，当然是迟了。”“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

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代会的职权越来越清楚，党代会的召开也已经逐步规范，因而，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从十二大开始，党的代表大会每一次都能够按照党章的规定如期召开，这不是一般的时间问题，而是我们党的政治生活走上健康和正常轨道的重要标志，是总结和记取了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一个重要表现，其意义十分重大。从1982年到2002年，连续5届党代会，串起了新时期党的历史，浓缩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20多年，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也是党不断前进的20多年。

至于党代会如何召开，也反映出党的建设和发展水平，尤其是反映党内民主的历史进程。

多数党代会，都能够围绕主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充分发表意见，包括发表不同意见，最终达到思想政治上的统一。

比如，一大出席13人，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也有说到8月1日），历时9天（包括转移会场的时间。或10天），通过一个纲领、一个决议。二大出席代表12人，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历时8天，通过9个决议案。三大出席代表30余人，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历时9天，通过7个决议案。四大出席代表20人，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历时12天，通过11个决议案。五大出席代表82人，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历时13天，通过7个决议案。六大出席代表142人，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历时24天，通过18个文件。七大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历时50天。……可见，每次党代会，时间不短，讨论的议题都很多，也很深入。

在八大上，除了毛泽东作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之外，还有113人作了大会发言，70篇未刊发言。这些发言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像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就是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的。

多数大会，在讨论中都会有不同意见。但可以发表和讨论。如三大对共产党员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是蔡和森和张国焘。两种意见都充分发表了。最后通过的，仍然是正确的决议。

在有些大会上，不同的意见可能恰恰是正确的意见。比如在1927年的五大上，陈独秀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报告。但代表们对此报告却十分不满，报名发言的就有38人。但可惜的是，正确的意见未能被接受。直到“八七”会议，陈独秀的错误才得到纠正。

党代会的目的，是要达到思想政治上的统一。这是任何大会都必须努力实现的要求。会议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这里。一般情况下，“一致通过”反映了全党意志的统一。但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一致通过”，未必就是好事。比如九大，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大会通过的党章，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精神。至今我们未听说大会上有多少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只不过是“万马齐喑究可哀”而已，并不能真正消除内部思想实质上的分歧。所以，大会之后两年零五个

月,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就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引起举世震惊。

可见,如何处理思想活跃与思想统一的关系,实在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既要充分展开讨论,又要保持思想政治上的统一,两者必须有机结合,防止任何偏颇之处。总结历史,这是需要非常谨慎处理的一门政治艺术。

为了开好会议,有些党代会,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能够将会议的议题、内容事先通知党员,征求党员的意见。比如,1925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党代会,事先就于1924年8月31日,由中共中央向各地发了一封信,要求各级组织:“对于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组织上各种问题发表其意见,并于小组会议时提出讨论,以其结果报告中央。个人有特别意见者,指令其写成意见书,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据档案资料反映,当时就连远在莫斯科的中共旅莫支部,也给中央写来了专门的报告,不仅汇报了对各种问题的讨论情况,而且各种观点多少票,都详细记录在案。

因此,我们看到,凡是成功的大会,都有某些成功的建树,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有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如,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伴随着党的脚步前进,党的建设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到洗礼。从十二大到十六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一次代表大会,都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重大的创新,从而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向前迈出坚实而有分量的一大步。

十二大,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十三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明确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按照邓小平的构想正式表述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十四大科学概括和评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十五大继续前进,总结了20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鲜明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明确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

十六大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科学地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对党章进行了修改,使党的根本大法更加完善,为新世纪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更加科学有力的指导。

由此可见,党代会是党的历史的一个个重大的节点、一个个关键的环节、一个个集中的标志、一个个准确的缩影。党代会的历史构成党的整个历史的主干脉络。对党代会的研究当然不能取代对党的整个历史的研究。因为在党代会之外还有无数丰富多彩的活动、画面、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的也对整个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不能有丝毫的忽略。但,基于党代会的重要地位,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党代会的历史,党的历史也必然成为一部没有骨架、没有灵魂的历史。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党代会的研究。在各种比较完整的党史著作中,对党代会的介绍和叙述都是重头的内容。但尽管如此,我们对党代会的研究还是不够的。除了对党代会本身的内容、议题、进程等研究得还不够外,对会议的方式、出席人员的活动,以及其他一些历史细节等等,也多有不甚了了之处。

基于这种状况,加强对党代会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最近一些年来,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加强了对党代会历史的研究。比较重头的,是主持拍摄了大型文献片《光辉的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系统地介绍了到当时为止党的15次代表大会的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随后这几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在有关方面和老同志,包括一些热心的老同志后代以及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又开展了对党的七大的专题研究。历经数年,花费大量心血,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编撰出版了或正准备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选编》、《七大代表忆七大》、《七大代表在七大》、《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纪念中共七大召开60周年论文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等多部著作,构成了关于七大研究的一个系列。这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受到了许多老同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特别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2003年9月专门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一书作序,肯定这部书“重点抢救和系统整理了有关的珍贵资料,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一个历史缩影”,“是迄今为止关于党的七大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成果”。庆红同志还“对所有为这项成果的取得而倾注了心血、提供了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强调:“全面、系统地研究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史研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党史工作者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付出艰苦的劳动,党史工作者们应当继续为此而努力。”庆红同志的序言,是对我们开展七大研究工作的一个巨大的鼓舞、支持和鞭策。

为了进一步落实庆红同志的指示,一方面,我们继续深化七大研究,基本形成了七大研究的系统成果。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对其他历次党代会的系列研究。现已将编写一大至六大和八大的代表名录、档案、会议史等,列入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6—2010年的工作规划之中,争取形成一套研究党的代表大会(一大至八大)的系列著作。

李景田同志就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之后,还十分重视党代会历史遗址的保护和开发问题。他已先后考察了上海的一大、二大、四大遗址以及当年党中央的一些办公场所,考察了广州的三大遗址,并对这些遗址的保护和开发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根据他的要求,我也分别考察了上海、武汉的一些与党代会有关的历史遗址。目前,广州的中共三大会址,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部署下,其保护和开发工作已经取得重大的成果,三大会址纪念馆不日就要正式落成和开馆。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

研究党代会的历史,既是为了更加准确地“存史”,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资政”。我们党历来注重研究和总结经验,为执政兴国的工作大局服务。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资政育人”。对党代会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我在中央党校工作时,在1999—2000年间,作为中央布置的调研课题的一部分,曾经对党的历史上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并提交了研究报告。研究结果表明:是否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规定。二大至六大,

七大代表忆七大

规定党代会每年召开一次。七大规定党代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其间可开党代表会议。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说明了为什么要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问题,强调这是一项“根本的改革”,并具体分析了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好处。到1969年,九大取消了党代会常任制。1982年9月召开十二大时,曾经考虑过恢复党代会常任制的问题,但最终没有实现。主持十二大党章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在就新党章修改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时,专门回答了一个问题:“新党章为什么不规定代表实行常任制?”他当时所说的一些理由,现在看来已不是很适合。因此,我的意见是:要不要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问题,看来还需要重新研究。当时我们在内部对党代会常任制的研究,实际上开了一个头,促进了人们对党代会常任制问题的思考和关心。到十六大时,水到渠成,大会确定,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并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目前的试点正在继续进行当中。举这样一个例子,主要是说明,研究党代会的历史,能够对党的实际工作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党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非常需要研究和总结历史的经验,也包括党代会的经验。

所以,本篇序言的主题就是:加强对党代会历史的研究。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广大党史工作者的努力下,我们对于党的代表大会的研究,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并对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包括对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发挥积极的作用。

2006年6月5日



目 录(上册)

序一 龚育之 1

序二 李忠杰 3

中直、军直代表团

- 赵毅敏 七大的往事永远在我心中 1
朱宝庭 回忆我第一次参加劳动节 7
吴 烈 警卫七大 9
王 林 我参加七大前后的一段经历 12
黄火青 往事历历忆七大 18
李延禄 回忆国际主义战士伊田助男 25
胡嘉宾 通往延安的历程 28
戴镜元 一本珍贵难忘的纪念册 33
刘 寅 忆红军无线电通信初创时期的片断 38
刘 英 七大何以推迟多年才召开 45
师 哲 共产国际派我参加七大 49
胡乔木 我所知道的党的七大 55

陕甘宁边区代表团

- 马文瑞 七大——划时代的盛会 72
段德彰 七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79
黄罗斌 当选七大代表 81
王世泰 关于七大前后的一些经历 88
白治民 皓首丹心忆盛会 95
白栋材 我当七大计票员 100
叶季壮 战斗在革命的洪流中 102
白炳忻(马义) 我对七大的回忆 108
王 俊 一切为了党的事业 110

七 大 代 表 忆 七 大

- 白 茜 我是七大女代表 117
白向银 关于七大的片断琐事 119
强晓初 双喜临门的日子 123
霍维德 革命战争年代的回顾 129
王恩惠 一次受教益 终生难忘怀 133
黄静波 争取光明前途的准备 139
周 兴 我的革命风雨历程 144
李子厚 我的革命生涯 148
任成玉 难忘的革命经历 150
王丕年 七大——历史的转折点 153
张秀山 七大成功召开的保障——七大召开前的整风学习 158
贺晋年 我记忆中的七大 164
张邦英 我与七大 170
崔田夫 在陕北的战斗经历 173
白国英 回忆参加七大前后的情况 176
莫文骅 难忘的历史盛会 179
李赤然 七大——走向胜利的丰碑 188
余秋里 整风运动与七大 197
刘 庚 经新疆回延安 200
宋 文 参加七大前后 203
刘英勇 我的革命经历 206
彭毓泰 关于参加七大及陕西代表团情况的回忆 209
朱开铨 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的经历 213
吴岱峰 我参加七大的一点回忆 221
金如柏 从加入共产党到参加七大 223
黄新廷 难忘的激情岁月 226
杜 平 我参加七大的情况忆述 239
杨秀山 七大的光芒 242
方 强 载入史册的宏图盛会 249
杨和亭 七大精神永放光芒 256
欧阳毅 毛泽东提名我为七大代表 261
邓 飞 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271

晋绥代表团

- 罗贵波 接送七大代表和出席七大 279
赵 林 历史的回顾 294
刘俊秀 七大——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大会 298
贺 彪 “也须自我求团结” 303
钟南辉 为了更光明的未来 308